

政治与哲学的张力——对柏拉图洞喻的探究

蔡竞仪 2013200677

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最核心的是哲人王的命题，即哲学家成为统治者，但是为什么要哲学家做统治者呢？因为哲学家最不想去统治，正因为他不想去统治，所以他最适合做统治者。这是《理想国》这本书最核心的矛盾，也正是在这里，体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永恒的张力。

柏拉图的洞喻

《理想国》卷七中，苏格拉底提出了洞喻。“洞穴比喻”是假想一群人被绑在山洞里，他们只能面对山洞尽头的墙壁，不许回头，不许往两边看，在他们身后的高处有火堆。借助火光他们可看到投射到墙壁上的影子，他们认为影子就是真实的，并以最能看清影子的人为最高明的，并选举他们为领袖。这时假设有一人因某种原因被迫站起来，解除桎梏，往后看。他会看到火堆，借助火堆的火光他会发现原来还有物体本身，影子只是光照射到物体上投射到墙上的影子。此时被解除束缚的人沿着斜坡向上走，逐渐走出洞穴来到地面，此时阳光对他来说太过刺眼了，他转过身来，逐渐使自己的眼睛适应更强烈的阳光。当被解除束缚的人适应了刺眼的阳光后，他就可在阳光下走动，看到各种物体，日月星辰，知道四季更替，春种秋收。走出洞穴的人正是哲学家。

“洞喻”显示了由意见向真理的上升过程。一开始人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火光投下的影像，影像是被扭曲的意见，有人挣脱束缚，转身看到火光本身，意味着他接近了意见。看到火光的人走出洞穴，背对着太阳，这个时候他能够看到事物的影子，等到适应了阳光，他就能看到事物本身，也就是获得了真理。柏拉图说：“在可知世界中最后看到的，而且是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到的東西乃是善的理念。”

柏拉图认为，解除束缚的人还必须回到地穴中，以解救他的同伴。必须承认，这并不符合哲学家的利益，回到地穴中，哲学家会不适应地穴中的黑暗，起初他们会什么都看不见，而当他向他的同伴叙述他所见到的世界时，这对仍在束缚中的囚徒来说显得过于荒诞，哲学家也许会成为无知的取笑或善意的玩笑的对象，但是他们更有可能成为妒忌、嘲弄或蔑视的对象。在柏拉图的讲述

中，他作为危害人民的分子，甚至可能遭受迫害、折磨与死亡的威胁。

究其原因，是因为哲学生活与城邦的政治生活的追求是背道而驰的。哲学是以真理为目的的，不献身于哲学的生活尤其是城邦的政治生活，就像洞穴里的生活，洞穴居民只能看到制造物的影子，他们用因袭自立法者的意见来理解他们所知觉到的东西，而不知道即使立法者所有的也远不是真理。因此即使在最好的城邦里，人们也会犯这样的错误。只有走出洞穴的哲学家才能超越意见，获得真理。

对于哲学家而言，返回洞穴是被动的，也是必然的。虽然灵魂的寓所归属真理，但是哲学家的身体仍然属于俗世。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确立了真理和意见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一种张力。即哲学家对这个曾经生活过的洞穴产生了陌生感，他的看过太阳的眼睛已不再适于去看洞穴中的影响，他已经丧失了使自己适应这个共同世界的熟识感。另一方面，正因为哲学家失去了对洞穴生活的熟悉，他的言辞和行为就会收到大众的嘲笑甚至攻击。柏拉图认为，真理的本质存在于存在者的理念之中，因此，真理与意见之间的对立可以表现为哲学家与大众之间的对立。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如果必须在真理与意见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哲学家的命运就风雨飘摇，《申辩篇》中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就是一个例子。

柏拉图对哲学家返回洞穴的结果做出了悲观的预测，让读者觉得，强迫哲人返回洞穴，分明就是对他们行了不义，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最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他觉得哲人在逃离枷锁、见着太阳以后，会同意返回洞穴里去，面对必然的失败乃至死亡？

对政治家的哲学教育

柏拉图曾三次前往西西里的叙拉古。在柏拉图四十岁左右第一次去西西里的时候，他结识了狄翁，狄翁是老狄奥尼索斯家族里面非常有权势的年轻人。柏拉图发现狄翁和所有西西里人的生活方式都很不一样，他过着一个哲学家建议的有德性的生活。所以柏拉图第一次去西西里，和狄翁建立了长达三四十年的友谊。大概在柏拉图六十多岁的时候，老狄奥尼索斯死了，狄翁给柏拉图写信，告诉他小狄奥尼索斯是可塑之才，力劝柏拉图来到西西里，实现其哲学和

政治的双重理想。于柏拉图第二次来到西西里。但是这次出行是非常失败的。因为小狄奥尼索斯周围的人告诉他，狄翁之所以把柏拉图请来，是为了让他醉心研究哲学，以便自己把控政治权力。于是小狄奥尼索斯就把狄翁驱逐出境，流放到了雅典附近。柏拉图也不能幸免，他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才离开了西西里。过了几年之后，小狄奥尼索斯再次邀请柏拉图。柏拉图的朋友告诉柏拉图，这次小狄奥尼索斯是真的喜欢上了哲学。于是柏拉图又一次去了西西里。

这个故事的吊诡之处在于，既然哲学家是最不愿意统治的，为什么柏拉图要应邀前往叙拉古，更奇怪的是，在第一次失败之后，为什么他还要尝试第二次？对此，李猛老师的解释是，如果柏拉图不去，就意味着他背叛了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称其为对哲学的背叛？因为“不去叙拉古教育一个有希望成为哲学家的君主”的这个行为割断了 Logos 和政治行动的关系，即意味着哲学家只是在学院里思考道理而不能把这种道理转变成实际的行动。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政治权力和哲学权力的显现。一方面，恰恰是因为政治行动必然会牵涉到的权力使我们看到的这个教育失败了，叙拉古宫廷中的这些小人，正是在这里挑拨了哲学家和僭主的关系，使得僭主猜忌哲学家进行哲学教育的动机，即狄翁让我从事哲学是为了谋求他自己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要承认，哲学的力量和政治的力量是两种不同的力量。《理想国》的洞见就是，承认哲学的力量不必然是政治的力量。那么二者如何才能结合在一起？

柏拉图最初前往叙拉古（回到洞穴的动机），是为了通过教育造就二者的结合。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存在根本矛盾的一个做法。这个矛盾早在《理想国》里就有。卷六中，苏格拉底用航海家与船只的比喻来讲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处境。他分析道，哲学和哲学家之所以受到非议，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城邦的统治者不接受哲学家的教育；第二是因为，拥有最好的天性的人是适合哲学的，但是如果有哲学天赋的人得到的是不合适的培养，那么最好的天赋就会比差的天赋所得到的结果更坏，他们最容易堕落成糟糕的人，因为他们身边会有很多人因为他们的天赋，引诱他们去统治城邦；第三，如果最配得上哲学的人离弃了哲学，而不配学习哲学的人，不相称地和哲学结合起来，哲学的声誉就会被败坏。

说到第二种情况，最好的例子是阿尔喀比亚德。雅典人听取了阿尔喀比亚德的建议远征西西里，派他远征之后，又在城邦里审判前线的军队，于是阿尔喀比亚德毫不犹豫地叛逃到斯巴达，帮助斯巴达军队采取果断的军事行动，打败了雅典。从此之后，雅典再没有机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翻盘，因为它的全部的青壮年都死在了西西里的战场。后来阿尔喀比亚德又从斯巴达叛逃到了波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哲学教育最糟糕的结果，哲学家教育了一个好的青年，他拥有无限的才华，他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按照当地人最好的方式生活，但他不遵守城邦的任何法律。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做一个辩护，这个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哲学天性自身的一个堕落，因为阿尔喀比亚德这样的年轻人拥有最好的天性，所以周围总是有人劝告他不要过哲学的生活，而要过政治的生活。而越是最好的哲学天性，在其深处，越是有一种强烈的统治欲望。这种欲望是自然的，它会把人自然地引向这个方向，转向政治，背离哲学。

小狄奥尼索斯的故事，似乎是第三种情况。柏拉图第三次去西西里的时候，小狄奥尼索斯表现得更加爱哲学，他想要表现自己比柏拉图更像是一个哲学家，他还写了一本书，把他道听途说的柏拉图的观点拼凑成了一本自己的著作，让柏拉图十分恼火。这是哲学教育的失败。我们看到，柏拉图试图把讲道理的能力和行动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或者说，通过教育使政治权力和哲学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做法失败了。

在柏拉图的著作中，政治与哲学结合的政体是最佳政体，它被称做祈祷的政体。所谓祈祷是说，这个最好的政治能不能实现，某种意义上听凭天意的安排。但是哲学家会遭受一个巨大的诱惑和动机，是希望用自己得到的政治权力把自己的哲学理想强加给自己的国家。这是最好的哲学天性面临的最大的危险，这也是《理想国》中谈到的另一种哲学的堕落。在《理想国》中，除了谈到最好的哲学天性因为统治的原因中断了哲学学习，因为成为一个政治的统治者，从而败坏了自己的灵魂之外，还谈到了另外一个危险，所有希望成为哲学家的年轻人，他的灵魂有一个巨大的无法无天的欲望。苏格拉底在《理想国》里对格劳孔说，一个人被养父母养大，对自己的养父母很好，但他有一天知道这不是他真正的父母，当他发现他只是名义上、习俗上把他当做父母的时候，

难道他不最容易被周围的人劝告去为所欲为地实现自己的欲望吗？难道他不是最容易把暴力施加到自己的父母的头上吗？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一般人会觉得习俗和传统非常值得尊重，而哲学家会发现这些东西都只是洞穴墙壁的幻影，所以他不会像大众那样去遵守城邦的习俗和传统。

一个哲学家和一个僭主——最好的人和最不幸的人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某种意义上都有一种无法无天的欲望，而这个欲望容易导致最大的危险，即屈从于政治暴力的一个诱惑，希望通过暴力，而不是通过自己的朋友和生活慢慢去改变现状。这正是狄翁采取的政治方案，他带领军队反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父母之邦施加了暴力；而且他借助的是非哲学的友谊，采取了世俗生活结交权力的方式来结交朋友，最后被刺杀而死。这是柏拉图对整个狄翁悲剧的理解，这个理解包含了他对《理想国》的深刻的反思。《理想国》在第九卷全部讨论正义赞美结束的时候，苏格拉底对格劳孔说，每个人都要看自己灵魂中的那个政治，那个最好的政体是什么样子，而这个政体就是出于道理的城邦，这个城邦并不是就在地上一样，而是好像在天上一样。这是《理想国》里最接近理想国的地方。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把这个“天上的城邦”落到实处，但是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灵魂更接近这样的城邦。这是柏拉图的教育动机。

殉道者苏格拉底

《理想国》中用大字和小字来描述城邦和人的灵魂，但是在这个类比的终点，其实暗藏着矛盾。最正义的人——哲学家追求的是沉思的生活。而最好的国家的立法是为了整体的幸福，因此强迫哲学家关心和护卫其他公民的主张才是正义的。

回到城邦的哲学家，应该如何作为？苏格拉底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不关心他的公民同胞们关心的事物。他向陪审团发表的演说，开篇就是：“我整个是这里的言辞方式的门外汉。”（17d）【吴飞译本，66页】这句陈述说明，他要么不关心，要么就是不满意雅典同胞们的行事方式和关心之事。但是，他声称自己怀有深切的关心，或许比周围人关心得更深。在这些他深深关心的东西当中，就包括他的呼吁：“我在城中转悠，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你们当中的青年

和老人，不要这么关心身体或金钱，而是如何能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30b）
【吴飞译本，据英译有改动】。

苏格拉底告诉陪审团，他对灵魂状态（无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周围人的）的关注不仅耗尽了他的精力，迫使他无暇照顾自己的家庭，还使得他远离公共生活的事务，从那些与城邦有关的事情转向对私人生活的追求。这是他的原话：

“就是它【指苏格拉底的守护神——译注】反对我参与政事，而且我认为反对得漂亮。而你们要清楚地知道，雅典的人们，如果我很早以前就试图参与政事，我早就死了，那么我对你们和我自己都会毫无益处。不要因为我说出真话而对我动怒。凡是坦诚地反对你们或别的大众，阻止在城邦里发生很多不义或犯法的事的人，都活不了，而其实，谁若一定要为正义而战，并且想多活一段，他必须私下干，而不是参与政事。”（31d-e）【吴飞译本，113—114页】

当苏格拉底宣称他过的是一种纯粹的私人生活时，他的意思是说：他所诉诸的仅仅是他的听众的理性和自我省察的力量。苏格拉底不只是建议别人要对源于传统的权威保持独立，他也要激励起一种堪称对政治生活的“坚守原则的避让”。唯有避免参与城邦共同体的行动，苏格拉底式新公民才能避免卷入不义之中。他的格言看起来就是：“只要说不。”

关于苏格拉底的坚守原则的避让，他向陪审团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他拒绝参与谴责和处死雅典十将军的审判，这些将军没能在某次战斗之后收回战死者们的尸体。此时，他拒绝与集体罪责有任何瓜葛。第二，苏格拉底提醒陪审团，他拒绝遵照三十僭主命令去逮捕萨拉米斯的赖翁(Leon of Salamis)，他很清楚这个人将不经审判而遭处决。这两个例子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别的作家对此也有记录，而它们当中任何一个都能要了苏格拉底的命。在这两个事例中，苏格拉底让自己的道义充当了检验是否参与政治生活的试金石。他提醒陪审团：“我从不屈服于任何违背正义的人。”（33a）【吴飞译本，117页】

苏格拉底受到的第一条指控是不虔敬。何谓不虔敬，为什么它应该被视作一种罪行？对一个古代雅典人而言，不虔敬究竟意味着什么？苏格拉底没有适当地关心他的雅典同胞们所关心的事情。虔敬或信念就是公民的自然条件。无论社会是什么样子，每个社会的统治性原则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念。

但是，哲学不能仅仅安于信仰。哲学产生于一种以知识取代意见、以正确原则取代信仰的富有激情的欲望，这是一种永不止息和毫不妥协的欲望。对哲学而言，相信某种信念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必须能为他的信仰给出理由或论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以理性或真理来取代信念或信仰。因此，哲学必然与信念相互冲突，这几乎是自明之理。公民也许会不加怀疑地接受某些信念，因为他或她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秩序或政制，或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的东西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哲人却试图根据正确的标准，根据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东西来做出判断。作为对知识的追寻，哲学与信仰之间有着一种必要而不可避免的张力，换个方式来讲，这也就是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张力。

对于这个矛盾，苏格拉底所代表的一方认为，真理是最高的权威。正是由于哲人依赖自己的理智，他才能从国家的危险权威中得到解放，并且保护自己不会卷入已是政治生活必要部分的不正义和邪恶之中。另一种道德准则是通过《克力同》中法律的言辞而表达出来的，在此，具有强制性的是共同体的法律或“习俗”[nomos]，也就是共同体最古老、最深刻的风俗和制度。一种立场认为，哲学生活，经过省察的生活，才是最值得人过的生活；另一种立场认为，政治生活，参与议政、立法、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公民生活，才是一个人的最高天职。它们构成了两种根本不可调和的选项，两种不同的天职。任何试图调和或综合两者的努力，都只会导致对双方的不公正对待。柏拉图的意思似乎是说，为了过上最严肃和最值得人过的生活，我们每个人必须在两种立场中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然而，或许这并不是柏拉图的终极定论。毕竟，为什么苏格拉底选择了留下来饮鸩而死？为什么不让克力同帮助越狱，去克里特这个能让他安度晚年的地方，而这恰恰是我们看到他在柏拉图的《法篇》里所做的事情。苏格拉底对克力同给出的那些拒绝逃跑的理由，就是他以雅典城法律的口吻说出的那些理由，这是他真正的理由吗？还是说，因为他的朋友显然对无力帮助苏格拉底而感到负有责任，苏格拉底为了安慰他，所以才编造出这么一个谎话？

苏格拉底拒绝克力同的帮助，从而又一次证明了他比雅典法律更加高明。第一次是蔑视城邦对他的死刑判决，第二次是在临死之际，表明自己对死亡漠不关心。苏格拉底为自己保留了一种法律，同时又为克力同和像他那样的人示

范了一种对城邦法律的理性而高贵的服从。苏格拉底之死不是一个悲剧，绝对不是。苏格拉底在 70 岁时迎来死亡，并且有意使之成为一场哲学殉难的行动，这将使未来的哲学能被人们赞许地视为勇气和正义的源泉。柏拉图在一封书信里提到，他努力要将苏格拉底刻画得“年轻而美丽”，他有意美化苏格拉底，将他展现为一个不畏死亡、拒绝参与任何不正义行为，并将智慧授予任何愿意倾听的人。我们不知道“真实的”苏格拉底，我们能够据以判断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柏拉图和阿里斯多芬的描绘。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描述为智术师的苏格拉底必然有着天渊之别，后者是要让弱的论证变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柏拉图的所有对话都是对阿里斯托芬的指控所作出的回应。

《理想国》要求我们严肃地思考：一个由哲人统治并为着哲人而施行统治的城邦，它的样子或形式会是什么。就此而论，它似乎是《申辩》的完美注脚。《申辩》考虑的是城邦对哲学和哲学生活所造成的危险，然而《理想国》是在追问，由哲学统治的城邦会是什么样的。哲人统治会是什么样？正如苏格拉底告诉我们那样，这样一个城邦需要严厉的诗歌和神学的审查制度，需要废除私产和家庭（至少在城邦护卫者阶层中），还需要利用经过精心挑选的谎言与神话（今天可能会被冠以“意识形态”之名）以充当政治统治的工具。柏拉图也进行了三次艰难的西西里之行，目的是要劝谏两位国王。尽管他想把这些叙拉古僭主改造成柏拉图式的哲人，但这样的使命统统宣告失败，而且致使柏拉图从此退出了政治事务。然而，柏拉图将哲学与政治联合起来的抱负，却是萦绕在此后的政治哲学心头的梦想。对苏格拉底和他的同伴们身上显得滑稽可笑之处，也许在其它时代、其它地方就会显得十分不同。“受到哲学教育的政治家”的理念（其未来的典范就是“开明的君主专制”）回响于整个近现代时期之中。以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卢梭为例，哲人们都想向政治领袖，或向那些能将他们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的人进言。

大多数针对柏拉图哲人王的反驳意见都集中在这一理念的可行性上。不止如此，这个想法的说服力也很成问题。哲学和政治真的能联合吗？哲学的需要似乎与政治统治的需要大相径庭。你能想象苏格拉底愿意放弃他的对话，而投身于沉闷的立法与管理事务吗？柏拉图描绘的哲人是知道众多殊相背后的永恒形式的人。但是，这种知识又怎么能帮助我们应对瞬息万变、潮起潮落的政治

生活呢？柏拉图未尝明言。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哲人可能会滥用政治权力。哲人并非思考机器，他们是由理性、血气和欲望构成的人。难道执掌绝对的政治权力的哲人就不会被诱使去滥用他们的职位吗？

于是，我们必须自问的问题，就是哲人王也想要追问的问题。柏拉图似乎将我们的注意力拉向这一事实：政治权力就是哲学最深切的愿望。整部《理想国》就是苏格拉底想要统治雅典人的失败野心，以及柏拉图劝谏西西里僭主的失败尝试的替代品。我们至少可以从这种解读中得到两个言外之意。其一，柏拉图是革命传统的真正奠基者，他是一个试图将理论与实践、理性与现实联合起来的人，这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学说那里发挥到了极致。在这种解读下，柏拉图就是下述观念的奠基者：政治就是一项由知识分子、理论家和兼具哲人与神父于一身的人所领导的活动。这种政治观念一直以来都受到哲学传统里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再到柏克的保守主义者攻击，这些人都对通过一项理性计划或程序来变革政治的做法深感疑虑。

但是，《理想国》还有第二种解读方式，它强调，将哲学与城邦联合起来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它所强调的不仅是这么做对城邦所造成的危险，也有对哲学所造成的危险。将哲学变成某种政治统治的工具，这种做法必然会将哲学变成某种“意识形态”，变成某种宣传活动，为了确保自己牢牢掌握政治权力而不得不诉诸谎言、扭曲与半真半假的说辞。《理想国》中，有一处地方经常遭到人们忽视：城邦里没有一个非柏拉图主义者。对思想实行绝对控制不得不沦为僭主的行径。如果哲学还是批判的活动，而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工具，那么它就需要对城邦保持特定的距离和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从这个视角来看，哲人王的提议肯定会宣告失败。至少对某些读者来说，它阐明了政治与哲学之间必须保持一定距离。

《理想国》首要的是一部关于改善灵魂的作品。这并不是说它要教导我们卸下政治责任，绝非如此。哲学（当然是苏格拉底的哲学）需要朋友、同伴和对话，它不是孤身一人就能得到手的東西。苏格拉底显然明白，那些想要改善他人的人必须首先改善自己，必须“在他自身之内创建一个城邦”，但许许多多想要模仿他的人不够细心。

我们很容易把《理想国》和僭主的秘术混为一谈，很多人也确实有这样的

看法。整个 20 世纪都被那些自立为哲人王的人搞得乱七八糟：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哈梅内伊就是个中典型。但是这样的人皆非哲人，他们对正义的信仰只不过表达了他们的虚荣与野心。对柏拉图来说，哲学首先是一剂治疗我们激情的药方，是一种为我们欲望设下限制的方法。这恰恰是僭主的反面，柏拉图将僭主描述为一个拥有无尽欲望却缺乏最基本的治理能力的人，这种治理能力就是“自我治理”。

哲人与僭主的区别，阐明了两种十分不同的哲学观念。对某些人来说，哲学代表一种从混乱、野性难驯的激情与偏见中得到解放的方式，一种能带来安宁与满足的治疗。对另一些人来说，哲学是统治欲的源泉，是一切形式的僭主制的基础，也是我们冷战的意识形态岁月的基础。问题是，既然这两种倾向都在哲学内部发挥着作用，那我们怎样才能发扬一种倾向而非另外一种？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尝言：“谁来教育教育者？”这句话说的很对。我们能向谁寻求帮助？

最佳的答案或许来自苏格拉底。他展现了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应当如何死去，这两者同等重要。